

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
教育人类学研究中心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 第四辑

主编 ◇ 滕星

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 ——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研究

班红娟 ◎ 著

民族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三期重点建设项目
“乡土教材收藏与乡土知识传承研究” 项目编号: MUC98507-050201

香港乐施基金会资助项目“中国乡土教材收藏与研究”
项目资助号: CNG-94697-01-0709A-K

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

——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研究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
研究/班红娟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11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 第4辑)

ISBN 978 - 7 - 105 - 12463 - 3

I. ①国… II. ①班… III. ①乡土教材—研究—河南省 IV. ①G4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1964 号

策划编辑:虞 农

责任编辑:向 阳

封面设计:孟 龙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网 址:<http://www.e56.com.cn>

印 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380 千字

印 张:13.875

定 价:4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2463 - 3/G · 1850 (汉 876)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6427190

由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64224782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总序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一门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类群体的文化遗产与文化学习、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教育学作为专门研究如何培养人类下一代问题的一门学科，也肩负着传递知识、传播文化的基本功能。这样，人类学和教育学之间就有了天然的脐带，教育人类学也因此成为二者之间有机联系的一座桥梁。

教育人类学（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or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是由教育学与人类学相互交叉并通过科际整合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其核心研究领域是多民族国家的少数群体教育，包括少数民族教育、乡村教育、移民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教育人类学吸收了包括哲学、法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形成于 20 世纪中期，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以欧洲德国、奥地利等国为代表的哲学教育人类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两大流派。在文化教育人类学流派

中，又可以划分为主要由人类学家组成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学派和以教育学家组成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

欧洲哲学教育人类学学派主要注重于从人的本质、教育的本质、人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发，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中的教育人类学学派，继承了英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概念与田野工作方法，并用其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则从英美文化人类学那里继承了“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并将其与美国的土特产——美国社会民族理论相结合来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其最初目标是为了捍卫以少数民族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其长远目标是想通过教育改革构建一个不分族群、社会阶层、性别、年龄、身体与智力差异的、乌托邦式的国家与全球多元文化社会。文化教育人类学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教育（包括移民教育和土著教育等）和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

教育人类学在国外已有长足的发展，其学科地位早已确立，并对许多国家的教育改革、教育政策、教育规划、教育咨询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人类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国际上对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文化差异与机会均等、多民族国家中主流民族与少数民族、国家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关系的讨论；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人们对教育与社会弱势群体倍加关注，教育人类学也随之成为一门社会与学术界瞩目的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

二

中国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起步较晚，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当时研究的重点是异文化和跨文化教

育。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大陆才开始系统引介西方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知识,传播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教育人类学获得了初步发展,不少学者开始尝试结合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本土的教育问题或试图建构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并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在20世纪80—90年代,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一直被冠以“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简称“民族教育研究”,其学科则被称为“民族教育学”,鲜有称为“教育人类学研究”或“教育人类学”的,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这是由于人类学这门学科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在20世纪初中期被引入中国时,产生的名称概念上的不统一,以及后来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历史的影响。20世纪初中期,人类学在英美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体系;在欧洲大陆的德国和苏联则将人类学称为民族学。当时的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赴德国进修民族学,并将民族学这一学科概念首先引入中国,尽管后来的人类学家吴文藻及其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先后将英美的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引入中国。但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大学院系调整、民族识别工作、少数民族研究,以及西方英美人类学被错划为“伪科学”,而苏联的民族学则占据着统治地位等历史的原因,使大陆地区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只能以民族学替代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当前,在西方人类学体系中,民族学基本上作为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下的一门分支学科。而目前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上,民族学被划分在法学门类下,而人类学则被划分在社会学门类下。同一门学科被人为地划分在截然不同的学科门类中,造成了人们在学科概念上的混淆。

其次,早期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主要以少数民族教育为其研究对象,很少以教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扩大关注主体民族——汉族的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故一直以“少数民族教

育”、“民族教育”和“民族教育学”加以称谓。

再次，由于该学科领域的许多研究人员对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历史与发展，以及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并不十分了解，导致他们对教育人类学与民族教育学学科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清晰。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带有争论的学术问题，在此不拟展开讨论。

20多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翻译引介了一批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著作，传播了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重要理念。

二是从理论上对这一学科进行深入探讨，试图结合国情研究大陆地区教育的发展问题或试图构建教育人类学的本土理论体系。

三是采用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关注异文化教育现象，提倡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寻求跨文化的了解和对话，特别是为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教育提供借鉴。

四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切入，解读汉族的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探讨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教育的文化功能等，在一个更广阔的人文背景下探讨大陆地区的教育问题。

五是积极开展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出现了一批具有本土意义的教育人类学民族志作品。

六是在一些师范大学和民族院校陆续建立了相应的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教学科研机构，开设教育人类学课程，教育人类学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完善，学术科研队伍日益壮大。

七是在吸收西方教育人类学学科素养的基础上，进行本土理论建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人类学理论。

八是以教育人类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多学科合作研究课题成果初见端倪，积累了一定的教育人类学本土研究经验以及与国际组织合作开展研究的经验。

近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出现了注重学科建设，注重

在本土经验基础上探讨全球性议题，更加关注现实问题解决的新气象。目前，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已走完学科萌芽阶段，由非学术化阶段开始步入初步学术化阶段。

三

在新世纪，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教育人类学，2001—2002年，民族出版社推出了由本人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这是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方面的第一套丛书。其第一辑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是一套开放性的学术丛书，它肩负着两个主要任务：一是系统介绍与评价国外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二是在批判性继承国外教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积累与展示中国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个案研究的最新和重大研究成果。它提倡走出书斋，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去研究当今中国的学校正规教育与社区、家庭的非正规教育。特别关注中国社会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和低社会阶层等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倡导书斋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推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与理论创新的精神。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共5部著作，分别为：《西部开发与教育发展博士论坛》（滕星、胡鞍钢主编，2001）、《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理论、政策与实践》（滕星、王军主编，2002）、《族群、文化与教育》（滕星著，2002）、《文化遗产与教育选择——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人类学透视》（王军著，2002）、《文化环境与双语教育——景颇族个案研究》（董艳著，2002）。这5本著作的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和中国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2005年，由本人担任主任的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获准成立，这是国内“985工程”高校中首个以建设教育人类学学科为主要目标的研究机构。该中心力图在“985工程”的实施推动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体系和教育人类学学科体系。

在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大力推动下，2008—2009年，民族出版社继续推出了由本人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二辑共10部著作，分别为：《多元文化与现代性教育之关系之研究——教育人类学的视野与田野工作》（钱民辉著）、《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本土经验与学科建构》（滕星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研究》（滕星、张俊豪主编）、《多元文化教育——全球多元文化社会的政策与实践》（滕星编）、《教育的人类学视野——中国民族教育的田野个案研究》（滕星、张俊豪主编）、《多元文化社会的女童教育——中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导论》（滕星主编）、《教育与社会发展——中国贵州省的一个社区个案研究》（罗慧燕著）、《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1900—1949）》（张慧真著）、《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滕星、王铁志主编）、《全球视野：教育领域中的族群性、种族与国民性》（西玛哈偌等主编，滕星、马效义等译）。这些著作中既有教育人类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有深入细致的田野个案研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水平以及国外相关研究的进展。

2005—2009年，在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现为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实施了五个重点建设项目，分别为：

（一）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

课程建构（滕星教授主持）；

（二）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开发的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基础理论研究（滕星教授主持）；

（三）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状况及存在问题调查研究（滕星教授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王远新教授联合主持）；

（四）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政策、法规与管理体制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劳凯声主持）；

（五）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与效益研究（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王蓉教授主持）。

在这五个项目建设的直接推动下，我们精心挑选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作为《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三辑出版，这些作品分别是：

《经济文化类型与校本课程建构》（滕星、巴战龙、欧群慧等著）、《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革与义务教育发展：社会学透视——从税费改革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郭建如著）、《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资源配置与效益研究——基于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贫困县的案例研究》（郭建如著）、《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应用研究——在学校教育和扫盲教育中使用情况的调查》（滕星、王远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研究论文选集》（滕星、王远新、海路主编）、《在田野中成长——教育人类学田野日志》（滕星主编）、《新创文字在文化变迁中的功能与意义阐释——以哈尼、傈僳和纳西族为例》（马效义著）、《土族、羌族语言及新创文字使用发展研究》（宝乐日著）、《多元文化整合教育视野中的维汉双语教育研究——新疆和田中小学双语教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艾力·伊明著）、《民族学校教育中的文化适应研究——贵州石门坎苗族百年学校教育人类学个案考察》（张霜著）、《社会变迁中的壮文教育发展》（张苗苗著）、

《中国乡土教材的百年嬗变及其文化功能考察》（李素梅著）、《学校教育·地方知识·现代性——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巴战龙著）、《人类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滕星、海路主编）、《书斋与田野——滕星教育人类学访谈录》（滕星等著）、《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民族院校》（张俊豪著）、《中国乡土教材应用调查研究》（滕星主编）、《无根的社区 悬置的学校——湖南大金村教育人类学考察》（李红婷著）、《文化变迁中的文化再制与教育选择——西双版纳傣族和尚生的个案研究》（罗吉华著）、《云南省孟波镇中学多元文化教师民族志研究》（欧群慧著）。

在完成“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三辑的编辑出版工作之后，在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教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从2012年夏开始，“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四辑（第一批）8部著作将陆续与读者见面，分别是：《乡土知识与文化传承——中国乡土知识传承与校本课程开发研讨会论文集》（滕星主编）、《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研究》（班红娟著）、《民族地区发展与乡土教材开发——宁夏回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张爱琴著）、《甘南藏汉双语教育历史与发展研究》（王洪玉著）、《拉祜族女童的教育选择——一项教育人类学的回访与再研究》（杨红著）、《台湾乡土教育历史与模式研究》（吴杰著）、《社会变迁中山西乡土教材的编纂与应用研究》（温润芳著）、《广西民族地区语文德育研究》（韦美日著）。

我们相信，《教育人类学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将在教育学与人类学学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它必将进一步推动人类学与教育学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整合，为教育学和人类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从而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作出贡献。

滕星

2012年5月修订于中央民族大学独树斋

序 言

近年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开展了“中国乡土教材收藏与研究”、“中国乡土教材开发的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基础理论研究”等项目，项目一是对流散在全国各地各个历史时期的乡土教材进行搜集并收藏，二是对各地乡土教材进行田野研究，撰写田野报告，三是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对一些地区的乡土教材进行专业研究，四是在甘肃、云南田野点以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为基础进行乡土教材开发。目前，项目已取得一定的成果，除收藏了大量散落在各地的乡土教材外，理论研究上也产生了诸多成果。我与学生李素梅的文章《中国百年乡土教材演变述评》^①对中国乡土教材自清末至21世纪的发展做了历史变迁的综述，李素梅的博士论文《中国乡土教材的百年嬗变及其文化功能考察》对乡土教材的百年历史变迁做了综述，并分析了乡土教材的文化运行机制及其文化功能。我与学生班红娟的《乡土教材：收藏、研究与开发》以访谈的形式对中国乡土教材的历史变迁、文化意义及项目的基本状况进行了综述。^②2009年10月举行了

① 李素梅、滕星：《中国百年乡土教材演变述评》，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② 滕星、班红娟：《乡土教材：收藏、研究与开发》，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中国乡土知识传承与校本课程开发研讨会”，会议成果浓缩在海路、巴战龙、李红婷的《中国乡土知识传承与校本课程开发研讨会综述》^①一文中。项目与田野点合作开发了两册乡土教材：《多元文化乡土教材——云南省勐罕镇中学校本教材》^②、《多元文化乡土教材——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二中学校本教材》。^③

今天，我更高兴地看到我的博士生班红娟在读博期间对河南乡土教材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资料挖掘和大量的田野调查，写出了《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研究》这样一本著作。该项研究借用阐释人类学范式，以文本分析法和田野调查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以百年来河南乡土教材的变迁为主线，透过乡土教材文本和本地人话语来阐释河南乡土教材兼具的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的双重文化意义，分析了乡土教材国家意识建构与地域文化传承的统一性。

在2009年10月举行的“中国乡土知识传承与校本课程开发研讨会”上，我提到了用中庸理论来解读现今的“和谐社会”理念。社会和谐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在中国文化中更是有着深厚的传统。《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如果用中庸思想的逻辑关系来解读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要稳定发展，就必须要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合理的社会秩序又以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和谐相处为前提，而要达到和谐，首先就要求社会各要素都能各得其所，各尽其能。我

① 海路、巴战龙、李红婷：《中国乡土知识传承与校本课程开发研讨会综述》，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② 梁华等：《多元文化乡土教材——云南省勐罕镇中学校本教材》，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9。

③ 安维武等：《多元文化乡土教材——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二中学校本教材》，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9。

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一个多民族多元和谐的文化，中国 56 个民族都有自己个性鲜明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这些都是各个民族在几千年里创造出来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财富，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但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全球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全球一体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们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好处的同时，也容易形成文化的同质，对文化多样性造成一定的破坏。从人类的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来看，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笔财富，是人类得以生存的一个基础，是人类创新的源泉，文化多样性的丧失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一样对人类而言是一种灾难，保护和传承文化多样性是教育人类学的基本理念。

我通过多年对国内外民族教育理论和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潜心研究与分析，提出了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实施“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Education Theory），也称为“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认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教育，在担负人类共同文化成果传递功能的同时，不仅要担负传递本国主流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而且同时也要担负起传递本国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多元文化整合教育”对象不仅包括少数民族成员，而且也包括主流民族成员。“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内容，除了包括主流民族文化外，还要含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少数民族不但要学习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而且也要学习主流民族文化，以提高少数民族年轻一代适应主体文化社会的能力，求得个人最大限度的发展。主流民族成员除了学习本民族文化外，还应学习少数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化教育”的目的是，继承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加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促进多民族大家庭在经济上共同发展，在文化上共同繁荣，在政治上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友好与和睦相处，最

终实现各民族大团结。^①

实行多元文化整合教育，课程改革势在必行。长期以来，中国基础教育实行的是高度统一的国家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强调为国家整体建设服务，这为培养统一的国民素质和推进国家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体现了国家对学生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共同质量标准。建国60年来，中国大约有30多年是“一纲一本”的时代，这个阶段中国的课程结构实行的是“过度的”国家普世主义教育。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高度统一的课程结构开始松动，出现“一纲多本”的现象，但这个阶段的课程结构仍然贯彻的是国家普世主义教育理念，只是将国家权力下放到了省级地方政府，县市以及基层学校课程开发的权力较小。2001年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纲要指出：“为保障和促进课程对不同地区、学校、学生的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文件的出台为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发展空间，由此，乡土教材的开发也获得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

相对于国家统编教材而言，乡土教材对于实现课程与教材的多元化，对于不同群体文化选择自主权的实现，对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对于培养人的爱乡、爱国情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教育人类学提倡每个文化群体的成员都有其文化选择权，并希望社会和政府能给这种文化选择权提供符合个体与群体适合他们要求的、不同种类的教育资源。乡土教材有助于不同人群文化选择自主权的实现。教育若不为人提供帮助，乃是一大失败。对于广大的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来说，乡土教育也可以为一些失辍学儿童提供基本的生存教育。在一些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并不能实现人才的流动，很多孩子还是回归传统的社区，过传统的生活，从事

^① 滕星：《民族教育概念新析》，载《民族研究》，1998（2）。

传统的生产，那么，涵盖本土知识和本土文化的乡土教材对他们具有更加实际的意义。他们需要知道家乡曾经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在这些变化中，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他们以什么去创建新的生活。在大一统的教育中，这些问题都没有给予解答。如果有了乡土教材的补充，孩子们的缺失就会得到弥补，他们的知识领域也会更加充足、完整。

同时，乡土教材承载有丰厚的地方文化、地方性知识，这些对于一个人桑梓情愫的培养有了重要的意义。急速的城市化会吸引许多乡村孩子背井离乡，当他离开故土时怎样看待自己的家乡，不屑、歧视还是充满珍视？乡土教材本身承载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对培养学生认识家乡、热爱家乡的感情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大多数人的桑梓情愫，都是缘于这些乡土文化的浸润和培植，因为它真实、亲切，所以很容易融入我们的血液里，成为我们生命的重要元素。也就是这些流淌于血液的元素，让它的子孙，不管是漂洋过海，还是客居他乡，都能时常梦萦故里，深深地爱着自己的故乡。不仅如此，乡土教材也是爱国主义的根基。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学生是“从直接表达爱家庭、爱学校、爱故乡的感情，逐渐过渡到认识更加深刻的社会关系，从理性上认识祖国的概念”。乡土知识具有直接性、具体性的特征，有助于“爱国”的具体化、深刻化。乡土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不热爱家乡又怎能热爱祖国？人们往往会对教材中有关自己家乡的人和事怀有浓厚的兴趣，这些人、事和他们生长、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因而备感亲切，更易于萌发爱乡之情、爱国之情。

我很欣慰的是，班红娟在对河南乡土教材历史变迁梳理的基础上，对河南乡土教材的文化意义进行了一种教育人类学的解读，把乡土教材的地域文化传承与国家意识建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其研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理论分析、研究方法上均具有鲜明的开拓性与较高的学术价值。

从研究内容上看，该研究以近百年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为依托，透视了乡土教材在国家意识建构与地域文化传承上的统一。清末，社会面临转型，国家被迫革新。乡土志是清政府应对生存危机不得不妥协而采取变革的产物。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清末乡土志更多的是为主流价值和国家主义服务的，凸显的是一种国家意识。清政府采取了通过乡土观强化国家观的程式，在培养乡土情的基础上养育人的爱国、爱朝情怀。乡土志的这种功能一直伴随其以后的发展历程。民国时期，在国民党只是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统一的情况下，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内战不断，各地地方自治、教育自治甚嚣尘上，乡村建设、乡村教育运动此起彼伏。在地方自治、教育自治的催生下，河南乡村教育及教育实验区中产生了一批乡土教材，这批乡土教材成为河南民国乡土教材的主体。民国河南乡土教材更多的是从地域状况出发，为河南民众最基本的生存生活需要而服务的一种教育工具，教材最主要的功能是教育民众、振兴乡村，实现教育自治与地方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这样一个新生的政权，迫切的是要国民树立社会主义的国家意识。在国家政治形势的影响下，20世纪50年代末的乡土教材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自编教材具有浓厚的国家意识，政治性、国家政治文化潮流成为教材的主要内容，乡土教材在地域文化的框架中坚定地传达着国家政治主流话语。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双基”教育成为教育的主旋律，受此影响，80年代至90年代的乡土教材成为学科知识的载体。进入21世纪，随着各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各地发展中的一个重头戏，地域文化自觉意识渐强，乡土教材逐渐成为教育领域中地域文化宣扬的主阵地。适逢三级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乡土教材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在地方教材与校本教材中诞生了一批地域文化浓厚的乡土教材。在研究的最后，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政治形态以及河南人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对河南乡土教材